

东亚 汉语史书系

李无未 主编

日本明治时期 北京官话课本语法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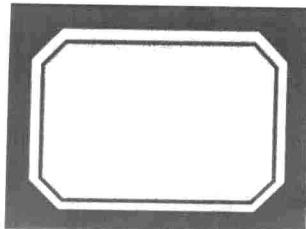
杨杏红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日本明治时期 北京竹语课本插图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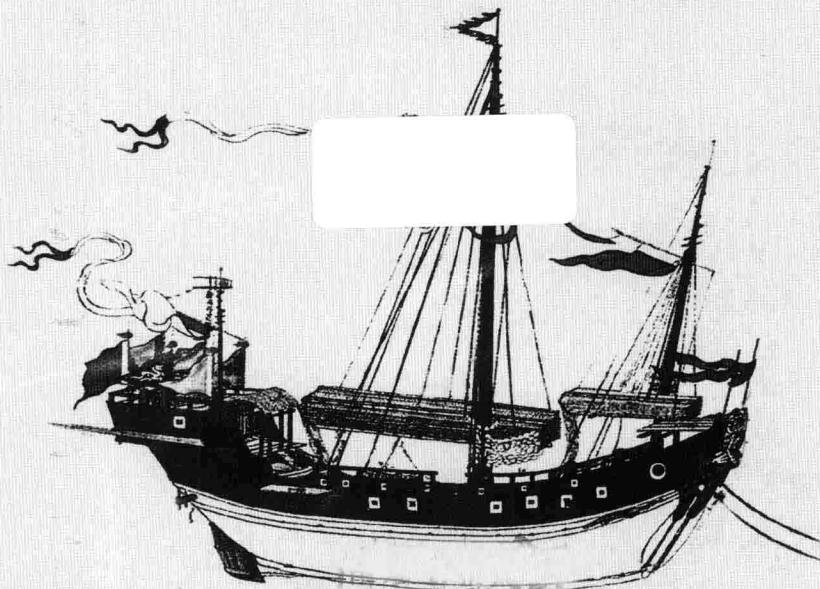


汉 语 史 书 系

李无未 主编

日本明治时期 北京官话课本语法研究

杨杏红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语法研究/杨杏红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5

(东亚汉语史书系/李无未主编)

ISBN 978-7-5615-5106-6

I. ①日… II. ①杨… III. ①北京话-官话-语法-研究-1868~1912 IV. ①H17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9387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xmupress.com

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8 插页:2

字数:308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4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2&ZD178]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语言研究”成果之一（鉴定等级为优秀）
厦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基金（2013）资助

东亚语言学视阈的汉语史研究(代序)

李无未

一、东亚语言学视阈与汉语史研究

“东亚语言学视阈”，指的是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语言学研究最优“整体性”视野，这超越了“国别”范畴和“语系”范畴，着眼于历史上形成的“汉字文化圈”内“跨文化”互动的东亚文明的语言学学术观照理念。

在东亚文明的语言学学术视阈内，汉语史所呈现的形态如何，其运动的形式、其学术走向及相互关系如何，这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东亚文明学术中心的动态移动及多样化，带来了汉语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全面变革，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迄今我们还没有理清的头绪，因此，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最终获得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收效。这是我们过去仅仅是中国学者自己看自己的汉语史研究，以及单纯的日本学者看自己的汉语史研究、朝鲜韩国学者看自己的汉语史研究、越南学者看自己的汉语史研究所不能替代的。有的学者讲：“从周边看中国”(2009)，从文明互动看中国，收获大不一样。而“相互观照”，“借镜观形”(《刘子新论·贵言》：“人目短于自见，故借镜以观形”)，以及“镜像折射”(mirroring)则更为客观。东亚文明的创造产生于相互运动、相互浸透、相互作用的生成系统之中(布罗代尔语，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3页，1998)，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也不例外。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以东亚各国语言学深厚的学术积淀为基础，形成固定的汉语史研究理论系统范式，肯定是具有十分广阔的学术前景的。

比如研究汉语语音史，文雄《磨光韵镜》(1744)“汉音、吴音、华音”三音理论，就是典型的“中古近代汉字音史”观念，与汉语语音在各个历史阶段传入日本直接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汉语语音发展史在日本汉字音上的“镜像折射”，可惜我们中国学者注意不够。还有朝鲜朝汉语官话语音的“质正”制度，在《李朝实录》中记载得非常详细。透过这个制度，可以看到朝鲜朝不断地按照汉语语音变化实际情况来修订自己的汉语官话语音标准，比如《老乞大》谚

文注音、《洪武正韵译训》语音等(李无未等,2013),这就给中国汉语官话语音发展,以及历史上的汉语语音规范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也是中国学者所忽视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语音资料相互印证,汉语官话语音的面貌就逐渐清晰了,就不是过去仅仅是凭借一方资料得出结论所能替代的。

透过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语音资料,我们还看到了什么?这背后的文化之间互动,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知识背景,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交流,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促成了汉语官话语音在东亚各国的“环流”,在东亚各国的“环流”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语言学传统,这当然包含了各自丰富的语言学理论内涵。在这样的视野观照下,汉语官话语音研究就一定会变得十分“鲜活”起来了。

二、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目标及内容

(一)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目标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力求实现三个方面的目标:1.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学术理论预期目标。(1)对东亚语言学视阈范围内汉语史文献进行总的清理、调查、整理、研究,在汉语史研究观念上是一次新的转变,在信息化的时代,信息获取通道变得如此便捷,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挖掘“海内外互动”,充分尊重个性思维,寻求共性思维,突破了地域与国别的“思维”局限,实现了“思维方式”上的新跨越。(2)真正地确立了科学而完整的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挖掘与研究程序,弥补了过去“国别”个体视野研究的种种弊端和缺憾,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变得真实可信。(3)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传统与现代理论的结合,孕育着研究思维模式和研究方式的新变革。比如传统文献整理方法(作者、成书、版本、文献源流、校勘、辑佚、语言年代等)和现代数据库手段的结合,为进一步描写与解释夯实了基础。(4)东亚语言学视阈多语种汉语文献同步挖掘,带来了人们对“协同”处理知识的信息系统的新认识,挑战与机遇并存,如此,对现代学者的素质要求也是前所未有的,与之相应的是,这会直接促进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语言理论与实际文献形态研究的进步,从而生成新的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语言理论范畴。(5)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的挖掘,集中了世界各国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理论与实际智慧,无论是语音,还是语法、词汇等领域,都是一次理论与方法的大检阅,对理清东亚各国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理论

与方法之间的源流关系,形成新的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发展理论和汉语学史理论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6)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的挖掘,不单是汉语史学科的独立行为,而是多学科“协同”的产物。在多学科参与的背景下,海内外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的挖掘,具有了学科复合特性,自不待言。但同时,也为相关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出路和借鉴。可以直接促进相关学科的繁荣与进步。

2.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学科建设发展预期目标。(1)通过研究,把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汇集起来,互通信息,共同研究,就会成就一支跨越国界的学术团队。这种“学术共同体”,是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学者协作方式的一种必然,更是促进国际间合作研究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的有效方式。(2)国内高校相关领域学者联合攻关,并与国际学术界密切沟通,大大开阔了学术新视野,更是提升了国内相关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竞争能力,对整合国内各高校相同或相近学科汉语史文献研究学术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3)国内外相关学者,发挥各自特长,集中攻关,不但衍生出对世界范围内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进行研究的创造力,还锻炼了队伍,凝练了方向,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研究特色,还牢牢地占据了国内外同类研究的前沿地位。(4)通过研究,会在很短时间内,积聚起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优势,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从而整体性带动东亚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进步,建立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信息集散中心,承担更多的国家和国际重大课题,并作为人才培养摇篮,在已经成为重点学科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国际一流重点研究中心。(5)对世界范围内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进行研究,所建立起的研究理论与模式,会产生积极的“蝴蝶效应”,一定会直接促进相关学科的研究。比如汉语海外传播历史的研究,带动了相关学科的进步。由此,便会崛起与海外汉语研究相关的学科群体。学科交叉,又会引发新的“范式”兴起,这是它所引发的学术轰动效应的结果。

3.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发现利用等方面的预期目标。(1)由于有了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的新发掘,会发现许多未知或重视不够的文献,当然会引发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新认识。比如日藏佚名韵书《五音通韵》,就与我国台湾所藏不同,韵图与韵书合刊,形成互补关系。(2)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有的就是东亚学者所刊印,这自然带来了东亚学者传播与研究汉语史的热潮。东亚流传汉语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域外之眼”十分独特,启发我们转换新的视角加以解读。比如文雄《磨光韵镜》“韵学唐音”,与日本江户时代学者认识明清语音有关,这就突破了我们《韵镜》为“本体”而《切韵》系

“今音”的研究视野范畴。(3)重视应用,而与东亚语言学视阈学术思潮相适应,对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的实际价值评判就有了不同于此前的意识。比如欧美学者对汉语口语语法的研究,其汉语口语语法理论意识远早于我们,他们的“敏感”,源于汉语口语学习的需要,这也影响到了日本,而我们还在争论官话的语言基础如何,说明我们的学术视野比较狭窄。与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口语语法文献相对照,就会发现他们的理论分析与实际文献的吻合度是相当高的。(4)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海内外文献发掘“互动”,无疑会使文献整理质量得以保证。比如《回回馆译语》,刘迎胜在本田实信所取德国杜宾根大学图书馆所藏明抄本、日本东洋文库所藏明抄本、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清抄本、巴黎亚洲协会所藏康熙年抄本、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所藏明刊本、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抄本互校基础上,又取中国北京图书馆藏本、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本等为底本,进行校勘和考证,力图恢复“乙种本”(永乐本)原貌,为下一步研究波斯语与汉语明代语音之间对译关系奠定了基础。(5)“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信息系统平台”建设,使得文献资料利用数据化,也就带来研究东亚汉语史的科学化,这和从前手工操作效果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有了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信息数据库,可以利用它进行国内外珍藏汉语文献校勘等文献学研究,从而开辟整理与研究汉语珍藏文献新途径。(6)利用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信息数据库研究汉语,无论是描写,还是解释,都是建立新的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研究模型的必备条件。它的文献应用前景也是十分广阔的,为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发展,树立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

(二)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研究总体框架及主要内容

1.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研究总体思路。通过对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的调查、整理与挖掘,并通过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研究汉语,实现汉语文献研究的新突破。这里包含着课题的基本范畴:(1)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调查。东亚各有关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所藏地点、目录、版本基本情况都要摸清楚。(2)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整理与挖掘。文献整理就是把这些文献分门别类编排,并加以文献学的整理,比如版本源流、校勘、著录、辑佚等工作。所谓挖掘,就是将文献可利用信息按照现代信息手段加以处理,建立“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信息系统平台”,为下一步的科学化研究奠定基础。(3)利用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研究汉语文史。在对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进行信息处理后,利用数据库汉语文献信息,并结合已有海内外汉语文献信息进行专题研究,从而实现“汉语文史研究”的新跨越。(4)编撰东亚语言学

视阈汉语史文献研究论著总目,以便于提供本研究的基本信息。(5)建立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理论和汉语学史理论“范式”,从而够更好地认识东亚汉语文献的学术价值。

2.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总课题与子课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根据珍藏区域及语言文字关系,比如是否属于“汉字文化圈”,把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分成两大部分,分别去收集整理、建立数据库和研究,然后再合成一个整体,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研究系列。这样安排的好处在于,充分体现东亚语言学视阈明清汉语史文献的各自文化内涵及思维方式、特点,有利于建立各自的描写与解释模型,既考虑到了共同点,也考虑到了个性特征。

当然也有交叉,比如东亚语言学视阈“汉字文化圈”内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除了“汉字文化圈”汉语及相关语言文献之外,也有与欧美语言相关的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等语言对比的文献,比如日本学者所编《英和支那语学自在》(1885)、《日汉英语言合璧》(1888),就是如此。遇到这类情况,还是以主要对象所属为主,协调处理。

在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中,东亚各国如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与欧美等洲国家汉语文献肯定有不少重复的,也要协调归属,进行统一研究,这样就避免了重复研究问题。还有,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与国内汉语史文献结合,以及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研究论著总目编写问题,都要进行科学统筹安排与协调。

三、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前提与方法、手段

(一)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前提

1.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最为重要的基础是具有基本的文献史料,否则,研究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各国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为依据,并结合海内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文献研究汉语史,是本课题研究进行的基本保证。所以,从文献入手,是最为可行的。

2. 使用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之前,还要注意对它们有一个文献鉴别与文献整理的过程,这是保证文献使用科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去伪存真”程序。作者、成书、版本源流、辑佚、校勘、著录、内容确定、价值判断,是研究汉语,并得出科学结论的前提。所以,文献整理是必须做的工作。

3. 将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处理为可利用数据信息,是科学运用东

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研究汉语史的当代化学术趋势。冯志伟说：计算机数据库辅助研究汉语，是“有限手段的无限应用”。计算机处理语言具有人工处理语言的无可替代性，优越性十分明显。

4. 学者们对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事实的挖掘，实际上已经贯穿了非常明显的“协同发展”理论意识，总体来看，以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动态变化理论为基本宗旨，逐渐形成了两大类理论模型体系范畴，即所谓描写性模型范畴和解释性模型范畴。但孤立地推崇和使用这两种当中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此外，应该认识到，描写和解释既是相对有界的，也是相对无界的，不能绝对化。我们在进行汉语史研究时，要注意汉语史研究描写、解释理论和方法运用的有界和无界关系，不能僵化地理解汉语史研究描写、解释理论问题。灵活地创造性地突破原有描写、解释框架，转换范式，才是汉语史研究描写、解释理论“保鲜”的保证。

5. 在长期的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成功地运用了一些科学性很强的研究模式，比如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汉语音话史的“双线”“多线”模式、汉语方言史层次分析模式、汉语史断代史模式、汉语史比较史模式、汉语史词汇扩散模式、汉语史“循环”模式、汉语史“演化尺度”模式等，我们不可避免地将有选择使用。

6. 利用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研究汉语史，许多学者已经取得了科学性很强的成果，我们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化、科学化的，由此，它存在着无可置疑的可行性。

(二)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方法

1.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收集整理方法。比如目录查询。像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可以将日本全国所藏中文古籍版本、收藏地点等信息一概收入其中，对查询者来讲，十分便利。严绍璗《日藏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经部”小学类也收录不少明清小学文献。“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资源库”收藏有《字汇》等。再如校勘方法，清末叶德辉《藏书十约》第七“校勘”，曾提出校勘之法有二：一曰死校，一曰活校。陈垣有校勘四种方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其他，还有版本、考证、辨伪、辑佚等方式方法。

2.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语料计算机输入。涉及汉字、假名、谚文、罗马字、英文、俄文、法文等具体种类文字输入方法，十分复杂，就目前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也有词汇、语法、语音等具体研究专业领域的个性输入方法。文字的识别方法运用与科学性很强的数据库建设关系十分密切。

3.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描写方法。运用描写方法研究东亚珍藏汉语史文献,根据具体学科的不同,分为语音、词汇、语法等描写方法。比如语音,有反切系联法、音系表解法等。而词汇的研究,有构词结构描写、常用词演变描写等。又比如语法,就有封闭性定量分析和静态描写等。还有的学者将描写方法分为共时描写和历时描写两类。具体的如,句子成分分析、层次分析等。

4.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解释方法。语音研究,历史比较法是基本方法,其他,如反切系联法、反切比较法、译音对勘法、内部分析法、时间层次研究法,以及词汇扩散、语言接触、音系构造、实验音系分析等。而词汇的研究,则包括词语的考证、构词法解释、常用词演变解释等。语法研究,有的学者分为共时解释和历时变化解释两类。具体的如,语义特征分析、语法化、变换分析、认知、移位、类型学分析等。

(三)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具体研究手段

1.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传统研究手段的应用。比如文献学研究手段的应用,像版本源流关系调查,就是进行版本的形制等时代标记确认;文献错讹校勘,从字形、字音、语句错简等方面纠正;文献辑佚,对散逸文本进行整合和补苴,尽力恢复原貌;文献著录,主要是明确各本著作的成书过程、年代等相关问题等。语言学手段的应用,像词语考证、反切系联、韵脚字丝联绳引等。

2.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现代研究手段的应用。涉及东亚珍藏汉语史文献信息处理技术的具体应用和资源整合方式,以及如何实现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资源语料库的开发和共享,还有相关电子辞典编制、各类软件开发利用的具体问题。

3.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综合研究手段的应用。这里包括实地调查、语音实验、数学模型、文献识别、语言、技术、抽样提取等各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手段的综合运用。

4. 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手段的可操作性。比如技术路线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文字识别可应用于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文献阅读、翻译、资料检索、编辑、校对、统计表格数据汇总与分析、编码的识别等。现在使用中的一些系统虽然比人读得快,但仍不能像人那样正确地读出各种各样的字符,与人的识别能力相比还有很大差别,远不能满足上述各个方面对文字识别应用所提出的要求,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具体研究方法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像目录查询，将传统目录查询和现代目录查询结合，相互印证，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目前最为通行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东亚语言学视阈明清语音文献，还是要应用所谓“历史比较法”。“历史比较法”，就是用汉语方言和外语借词作参考比较，“先从本国的材料得了结果，然后再拿对音当作一种试金石来对一对”。这种历史比较法，给中国音韵研究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将之引向一个广阔的领域。高本汉利用方言与外语借词对重建中古音系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依据二等肴韵在广州方言中的独立，确立了它在音系中的地位；依据越南借词中读音的分立，分开了喻三和喻四。同样，许多学者研究汉语近代语音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还有译音对勘法，比如日本汉字音“唐音”研究，具体如《唐话纂要》日语假名语音转写，就要考虑到假名标记与汉语明清官话语音的对应关系问题。有坂秀世、马渊和夫、高松政雄、沼本克明、汤泽质幸等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证明了它的适用性，以及在操作上的可行性。

本研究希望能为国内外汉语史研究者提供一个非常翔实而科学的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范式，对促进世界范围内语言学视阈汉语史研究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并直接推动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学科的科学化、现代化；以此为契机，带动相关学科的学术进步和交叉，衍生出更为广泛的学术领域，由此带来新的学术效应。以本研究为基础，强化东亚语言学视阈汉语史学科教学理论与内容的创新，可以使语言学等领域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本研究的开展适应了国家文化战略向纵深发展的需要，也有力地支撑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中文学科，搭建创新平台，拓展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更为外国学者了解中国汉语史价值和意义提供直接帮助。

参考文献

- [1][日]小仓进平《增订朝鲜语学史》，刀江书院，1963年。
- [2]李得春《中韩语言文字关系史研究》，延边教育出版社，2006年。
- [3]金基石《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3年。
- [4][日]文雄《磨光韵镜》(1744)，勉诚社，1981年。
- [5]李无未《日本汉语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
- [6]李无未《日本明治北京官话课本语言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成果，2012年。
- [7]李无未《日本明治汉语教科书汇刊》(30册)，中华书局，2013年。
- [8]李无未、张辉《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古汉语研究》2013年第3期。
- [9]严绍璗《日藏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

- [10]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
- [1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 [12]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13][日]沼本克明《日本汉字音の歴史的研究：体系と表記をめぐって》，汲古书院，1997年。
- [14][日]文雄《磨光韵镜余论》，勉诚社，1981(1744)年。
- [15][日]有坂秀世《国语音韵史の研究》，汲古书院，1957(1938)年。
- [16][日]本居宣长《汉字三音考》，勉诚社，1978(1785)年。
- [17][日]大矢透《韵图考、隋唐音图》，勉诚社，1978(1915)年。

中文摘要

本书可分为三大部分，具体划分如下：

第一部分为第一章，是本书内容展开的基础。主要介绍了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口语课本的出版情况、课本的语言特点以及有关的研究成果。此章的最后还对本书语料选择原则、研究的理论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介绍。

第二部分包括了第二、第三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

第二章从词法的角度对日本明治时期的北京官话课本语言进行了考察，具体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副词、介词、助词、语气词等九类，基本涵盖了比较重要的实词和虚词。第三章从句法的角度对日本明治时期的北京官话课本语言进行了考察，主要包括疑问式、被动式、处置式等三种常见的句法形式。主体内容虽然分为两部分，但在具体内容的描述上兼顾词法和句法的内容，如考察动词时，也谈到了跟动词“去”相关的句式；考察疑问句时，也提到了疑问代词的用法。

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第五、第六章，是本书内容的延伸。

第四章重点分析了日本明治中期的两部北京官话课本，指出了课本语言存在的偏误类型以及偏误形成原因。目前学术界多使用明清域外文献来研究近代汉语，取得的成果也颇为丰硕，但文献的可靠性还是需要认真甄别，本章首次对域外文献可能存在偏误这一问题提出了警示。第五章总结了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语言的语法特征。本章认为官话课本的语言代表的是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所以课本语言的语法特征也基本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官话的语法特征。第六章简单介绍了清代北京官话的形成、发展、演变的情况，并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清代北京官话的研究独树一帜，进行研究很有必要。这一部分内容提出了本书需要延伸思考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有关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语言的基本情况，虽然最近几年已有学者进行了讨论，但都是单个语言点的考察，还未见到对这些官话课本语言进

行整体研究的成果。本书从词法和句法两个角度，讨论了九大类词、三大句式的基本情况，基本涵盖了历史语言研究的重要问题。因此，完整性是本书在与其他同类成果相比时，最为显著的特点。

在讲求“面”的广度时，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点”的深度。本书并没有一味地追求完整性，而忽视对个别语言现象的深入考察。全书有些内容以“面”为主，如代词部分，较为穷尽地描述了官话课本中各类代词的情况；有些内容则以“点”为主，如介词部分，文中没有例举式地谈及官话课本中出现的所有介词，而是重点分析了官话课本中起始义介词的情况。在论述的过程中注意三个方面的比较，即：明治前后期课本使用情况的比较；跟同时期国内文献的比较；跟方言的比较。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过程中，描写是相对容易的部分，而解释却不易做好。本书在解释方面虽然还有不足，但在部分章节中我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如汉语共同语形成过程中语言的包容与取舍、语言接触对北京官话的影响，等等，这些理论思考都为将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启发性参考。

Abstract

This book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as follows:

The first part, as the first chapter, was the basis for expanded content of the article. This chapter mainly introduced the publication, language features and related research of Beijing spoken Mandarin textbooks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Meiji Period in Japan. At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we not only explained the principal for corpus' selection, but also illustrated the theories and research ideas of the article.

The second part is the body part of the article, including second chapter and third chapter. We investigated Beijing spoken Mandarin textbooks from the lexical perspective in second chapter. What had been studied here listed below: noun, verb (adjective), pronoun, numeral, measure word, adverb, preposition, auxiliary, modal particle, which covered a large part of important full words and empty words. We inspected Beijing spoken Mandarin text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tax in third chapter, embracing three kinds of common syntactic form: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passive sentences and diaposal sentences. Although the body part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both the lexical and syntactic aspect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ile describing the specific content. For example, the verb was analyzed from lexical and related sentence pattern; the use of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 was also mentioned when examining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The third part was an extension of article, including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 chapter.

We focused on two Mandarin textbooks of Meiji period in Japan in chapter four. In this part, we pointed out types of errors and causes of errors. Currently many scholars studied modern Chinese according to foreig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However, the reliability of these documents should be seriously screened and we couldn't ignore this problem. In chapter five, we summary the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hese Mandarin textbook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andarin textbooks represented Beijing Mandari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and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hese books was a reflection of Beijing Mandarin at that time.

Chapter six was an epilogue, which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formation and